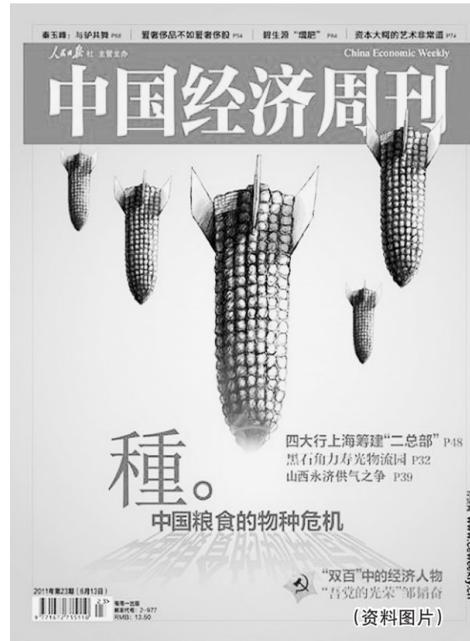


中国粮食的物种危机



核心提示

外国种业公司近年来大举进入中国种业市场,致使我国部分种业公司面临被挤出市场、市场份额被蚕食、自主品种被外国种子代替等困境,给我国种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并危及我国粮食安全,业内人士对此“心急如焚”。

对此,中国种业第三次“最高规格”会议,日前在湖南长沙召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此前已专门就我国种业发展作出重要批示,强调我国是农业大国,加快农作物种业发展是建设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是实施科技兴农、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

而如何保证国家对种业的控制力和主导力,做大做强中国的民族种业,牢牢掌控中国粮食的“命脉”,已然成为这个会议的重要话题。

外资先锋扩张中国

大名鼎鼎的美国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下称“先锋公司”),曾两次进入中国。

第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但那次先锋公司并没有打开中国市场;第二次是本世纪初。

2002年,先锋公司与我国最大玉米制种企业——山东登海种业成立了合资公司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下称“登海先锋”);2003年,先锋公司在辽宁设立铁岭先锋育种站,成立合营育种公司;2006年,先锋公司又与甘肃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敦煌种业——先锋海外有限公司(下称“敦煌先锋”)。

相关政策规定,合资公司的粮食品种不能直接从国外引进,先锋公司便采取了通过国内的铁岭先锋种子研究有限公司育种,然后再交给登海先锋和敦煌先锋销售的方式。敦煌先锋负责东北、内蒙古等地春玉米带,而登海先锋负责黄淮海地区的夏玉米带。

到2010年,该公司玉米品种“先玉335”在中国的种植面积有3000多万亩,加上相关品种,总面积估计大概接近6000万亩,约占玉米总面积的13%。

短短数年,先锋公司俨然已成为中国种业市场的“大鳄”。“先玉335”去年的纯利近6亿元,如果加上各种套牌,它在中国玉米种子市场上的纯利可能就达到整个市场的40%~60%。就是用百分之十几的种植面积,换取了近60%的利润,非常可怕。”大北农集团北京金色农华种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绍明对此显然很“震惊”。

先锋不是第一家,也不会是最后一家。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末,孟山都、先锋等跨国种业巨头陆续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在中国注册的外资(含合资)种子企业已经超过了70家。与此同时,国内种子市场价值也发展到500多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全球种业市场。

“现在国外大宗作物种子,基本上都是通过在中国设立合资公司,在国内生产销售。(合作育种)只不过是品种从国外拿到中国直接进行筛选,筛选完了以后,品种一旦适合中国,就开始在中国生产,做到育、繁、推一体化。”李绍明介绍说。

而对于很多合资公司来说,“虽然是合作育种,但核心技术它不会教你。名义上是合资,其实它就是跟你分利润,其他的育种,销售你都管不了。”美国玉米育种专家、中国玉米改良中心顾问张铭堂向记者透露。

我国种子基因成美国专利

这些外资“大鳄”迅速进行全球扩张的“绝招”是什么呢?

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万建民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某跨国公司在上海一个废弃的厂房旁发现一种生命力很顽强的野生大豆,他们特意去采了,并从中提取了一类抗病毒基因,通过分子标记手段在美国申请了100多项专利。于是,原产于中国的大豆,开始了跨国公司的手里发扬光大,以此陆续控制了巴西、阿根廷等全球大豆的种子市场。

之后,中国农民种植本国大豆,便侵犯了美国的专利权。

“因为在国际种子市场的游戏规则中,种子资源是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只有基因是受知识产权保护。对于这个游戏规则,我们还没有话语权。”万建民说。

就这样,中国祖辈们数千年来选育的几千万份种子资源,成为别人刀俎下的鱼肉。“你不给他们,他们说你保守,是计划经济;你给他们,他们从中提取基因申请专利,成为他们的专利产品。”

或许,这就是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一个“缩影”。

实际上,早在一个世纪前,跨国公司就已开始了类似的“全球扩张”步伐。

1908年,美国孟山都公司完成了第一次收购计划——收购伊利诺伊州的商用酸公司,由此展开了全球扩张。塑料、合成橡胶、调味剂等方面它都开始涉及,但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战绩。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收购了一家制药企业后,孟山都主攻方向开始转向高新技术产业。

第二年,孟山都的科研人员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改变了植物细胞的基因,实现了生物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这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生物技术革命。

此后的1985年到1993年间,孟山都进行了多次重大战略重组,逐步将研发重点更多地放

在了生命科学、农业、医学和食品上。

1998年5月,孟山都斥资23亿美元接管了美国第二大玉米企业迪卡尔,这使得孟山都都快成为美国玉米市场中的龙头老大。由此拥有美国棉籽市场85%的压倒性份额,以及在棉花种植行业的全球优势地位。

随后,孟山都又斥资14亿美元,购进了嘉吉公司在中美洲、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国际种子贸易业务。

自从20多年前专注于生物技术研发到如今,孟山都在生物技术方面共拥有600多项专利,不仅遥遥领先美国国内种业公司,同样把欧洲同行远远抛在身后。

有了这样的发展历程,近年来,孟山都、先锋、先正达和拜耳等外资企业与中国科研单位进行的交换品种资源以及挖掘人才等合作,令不少国内业界人士认为是“从源头上控制我国种业”而“心急如焚”。

国内种业“三十难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众多行业相比,中国农业的开放最晚,开放的程度也最小。

而国内种业市场更是如此。2000年《种子法》实施,开启了中国种业的市场化历程,改变了国有种子一统市场的局面。

于是,各路资本纷纷进入种业市场,民营种业公司、中外合资公司、科研院所自办公司、农技推广人员“自立门户”,甚至还有一部分“皮包公司”等,使全国注册500万元以上的公司已达8700多家,形成了“小、散、乱”的局面。

为规范市场,2010年12月31日农业部出台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该意见稿将杂交水稻和玉米种子企业注册资本从500万元提高到3000万元,实行一体化经营的种子企业的注册资本由3000万元提高到1亿元,并规定固定资产比例不低于50%。

“如果该办法实施,全国8700多家种子企业预计将有九成遭到淘汰。种业低门槛准入时代即将成为历史,行业洗牌已是迫在眉睫。”北京市种子管理站副站长、新闻发言人赵青春认为。

除了注册资金门槛提高之外,据赵青春介绍,按照国家要求,种业公司将实行产、研、销一体,严格要求企业必须要有科研机构,拥有3到5个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自有品种。

对于国内种业“小、散、乱”的局面,中国种子贸易协会副理事长张孟玉表示,“中国50强企业相当于一群麻雀,而且是在家门口觅食的家雀;而跨国企业是老鹰,数量不大,但是它们规模很大。”

“麻雀和老鹰怎么开展竞争和合作,就是整合麻雀的力量,能够把种子企业团结起来。现在我们必须造就一支强大的中国的种子行业组织,我认为以后的行业组织是我们整合麻雀力

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孟玉认为。

除行业自身因素外,李绍明指出:“国家应为种业公司、种业市场创造良好的外部产业环境。”

李绍明建议:“国家给农民各种各样的经济补贴,最好是转化成农业保险,这样更能有效保障国内种业公司的快速发展。美国农户的各种政策保险和商业保险高达9种,中国现在就一个政策性的农业保险,目前普及面还非常小,处在试点阶段,而且保额很低。”

“在得不到商业性保险和政策性保险保障的条件下,农民一定会将他的风险向上游转移,尤其是种子。中国种子承担着全球可能最重大、最多的社会责任,国内种业显然缺少做大做强产业环境。”李绍明表示。

同时,李绍明还认为,中国种业发展还有规模化制种与土地流转困难之间的重大矛盾。“如果一个村一百户农民中,有一户不同意搞制种,其他人同意没有意义,就不能搞,这是推进中国现代种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政策难题。”

中国制造“种业航母”

为加快国内种业发展,国务院在4月18日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

“这个‘意见’就希望把商业化育种能力,逐步地向企业转移,因为我们的研发能力大部分集中在科研院所。”万建民认为,但像中国种业集团、隆平高科、登海种业、敦煌种业等国内企业,他们有没有能力迅速地占领商业化育种市场,目前还很难说。

李绍明也指出,转基因育种中,现在国内企业还不具备基因的克隆和构建这方面的能力;而将人工制造或克隆的基因导入到育种材料中,现在国内只有7~8家公司具备这种能力。

万建民不无忧虑地表示:“现在如果科研院所让出这块阵地,希望国内这些公司去占领,而我们现在不具备这个能力,承担不了,那就是给孟山都、先锋留下一个真空,让孟山都们给占领了。”

因此,万建民建议,国家应尽快引导、扶植、培育3~5家具有研发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的民族龙头企业,把国内的种子资源控制起来,保持国家对种业的主导权和控制权。同时,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种业竞争。

“而且成立一个还不行,要有两到三个,这样才有相互竞争,并将现有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进行有效转移、整合。”万建民说。

事实上,在业内人士看来,最要命的是“中国种子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不足”。目前,拥有研发创新能力的国内种子企业不到总数的1.5%,绝大部分企业研发投入一般在其销售总额的1%,有的企业1%还不到,低于国际公认的“死亡线”。

在研发投入上,跨国公司一般占销售收入10%左右,有的高达15%~20%。如孟山都公司2010年销售收入为105.02亿美元,而研发投入高达12.05亿美元,先锋公司研发投入也高达16.51亿美元,甚至比一个国家的投入都多。

万建民介绍说,过去,我国农业科研投入一直不足,只占农业产业GDP的0.6%~0.7%,甚至低于1%的国际平均水平。“现在国务院批准了农业转基因的一个重大立项,15年中央财政投入是120亿,就这点钱大家还嚷嚷‘多了多了’,多么可笑。”

“还有,我们的企业都太小,不可能拿出更多钱来搞研发,而且它的投入都要10年、20年后见效。整体的研发投入少、周期长,让我们去跟孟山都、先锋去竞争,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万建民直言道。

对此,张铭堂也颇有同感。他建议:“国家应选几家有希望的、年轻、有潜力的公司,帮助他们很快地建立起高科技的科研体系,做大做强,成为中国领军的企业,这样才能和孟山都这样大的公司抗衡。”

“我们应建立起一套能够适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作物育种体系,这个时间可能需要10~20年,但是路走得对的话,可以走得比较快。唯有这样,我们在将来才有比较大的生存空间。如果我们跟在美国屁股后面跑,我们永远都在它的后面。”张铭堂表示。

据《中国经济周刊》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敏 电话 67655289 E-mail:cmvmy@163.com

权威声音

微博之力如何撬动现实

如果把2009年算成“微博元年”,不到3年,微博这个网络社交平台,已经成为舆论的重要集散地。近日,从江苏溧阳菜局长“微博开房”到“郭美美事件”,再到四川会理县领导“悬浮照”,诸多热点事件在微博上酝酿、发酵。以“郭美美事件”为例,无数“微友”参与爆料,相关发言就有64万余条。

这让让人看到微博的巨大力量,也让让社会管理者看到,网络与现实,无论是舆论场还是社会管理,都在打通交织,成为一体。“开房局长”自以为微博调侃不会为人所知,却在网民围观中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而“悬浮照”曝光后,当地政府通过微博及时道歉,避免了又一起“虎照风波”。

当前,仅新浪微博用户就已突破1.4亿。微博风生水起,客观上推动了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公共沟通与舆情应对能力的提升。从陌生、茫然,到积极研究、利用,微博问政已经成为很多地方的执政实践。近日,广东、浙江等地组织领导干部参加有关微博的学习和研讨,南京规定突发事件发生1小时内要进行微博发布,都是可喜的探索和尝试。

但根据复旦大学发布的《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到今年3月,实名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仅1708个,政府官员微博仅720个。巨大反差反映出一些社会管理者对这片舆论阵地的陌生。

尽管一些领导干部还不能适应微博时代的舆论新格局,但公众通过微博介入公共事务,表达个人观点,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现象。涉及政府决策、公共管理、领导言行的话题,往往能迅速成为热点。

实际上,微博上大多数人的“围观”或参与,归根到底还是出于关注地方政府工作的善意,出于帮助地方政府改进不足的诚意。正是这样的善意和诚意,使微博可以成为一个回应关切的最好平台。如果扬长避短、因势利导地做好舆论沟通和引导,积极通过微博平台了解民意、汇集民智,及早发现问题、处置问题,完全可以构建一个广泛参与、有序互动的微博舆论新环境,使微博成为社会情绪的“减压阀”、官员关系的“润滑剂”。

从论坛到微博,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之下,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能力都已极大提升。在微博展现谣言之后,“谣言粉碎机”、“辟谣联盟”之类反谣言专区的出现,体现微博的成熟,也折射公众网络参与水平的提升。然而,类似侵犯隐私、情绪偏激、造谣传谣的问题,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管理者更该以“善待、善用、善管”的原则,提高媒介素养,重视微博舆论场,回应社会关切,引导公众参与。

社会管理创新,离不开“虚拟社会”管理创新,越早认识到这一点,工作就会越主动。 民意

谁能独自承受“私人”的悲伤

6月28日,东莞母亲韩群凤溺死脑瘫儿一审被判5年。韩群凤婚后生下的双胞胎均患脑瘫,她辞职照顾儿子13年,最终因绝望将他们溺死并自杀未遂。(6月28日中央电视台)

13年,韩群凤经历了一段怎样的人生,媒体没提及,但凡是养育过孩子的人都知道。从生双胞胎儿子的喜悦,到发现孩子脑瘫的痛苦、

也足以让她一生都生活在心灵之狱中。

3年前,四川曾发生“姐姐虐待双胞胎妹妹”案,那也是双胞胎,姐姐感觉自己和父母再也不能承受妹妹的拖累,捂死了她。那是19年的守望最终没守来奇迹而产生的绝望。当时,案子也引起了争议,法庭最终“判三缓五”,本着活着的人还好好活着的原则,人性化地解决

了争端。面对如此“雷同”的人生悲剧,社会也需要反思。当陷入绝境的人,独自承受属于她“私人”的悲伤时,她的悲伤与绝望却属于全社会。这就像故事里讲的,法官在判决时无钱买面包而偷盗的老太太时,要罚法庭中每个观众一美元那样。作为看客的我们,也绝不是与这位母亲的苦难无关。 曾颖

“一根筋”下多少潜规则



爱大海、爱鸟,多年来,为了保护黄河湿地,山东东营的任增颖跟化工厂孤军奋战,她被称为“黄河入海口的神仙姐姐”。因为得罪了某些人,如今她被迫到800公里外的疗养院,当清洁工,做推销,远离那一块让她魂牵梦萦的湿地。

任增颖只是个档案管理员,却当起了环保卫士,不是她的活,她偏要干,而且干得这么投入,把别人的警告当成了耳边风。从2008年开始,“一根筋”给她惹了很多麻烦,在领导眼里,这样的刺头是在破坏发展大局,给她抹黑,更重要的是威胁到了他们的官位。

于是,本来是胜利油田“爱护环境模范”、东营市“文明市民”的任增颖被鉴定为“更适合从事体力劳

动”,送到了800公里外的地方打扫卫生。

这个时候跟他们说要珍惜社会良知,珍惜一个公民的权利意识,就很幼稚了。珍视了社会良知,谁来填补政绩的空缺,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了,意味着他们就不得不作出妥协。只有在任增颖这个异类身份一直当下去,

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如果把她还原为正常人,把她的中告当成合理的诉求,就意味着承认破坏环境的事实,那岂不是让官员跟自己的前途过不去。

合胃口的就是文明市民,不合胃口的就是“一根筋”;提保护环境时,是标兵,提发展经济时,她就成了拦路虎,“一根筋”下多少潜规则。写给官员的信香

无音讯,转给专家的邮件几乎没人回复。一个农妇所能做的一切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作用,她的声音很高亢,但激不起涟漪;没有人支持更没有人理解,反对化工厂,政府不支持,当地居民“没有反应”。多数日子里,她都在“孤军奋战”。面对工业文明的庞然大物,她只能感叹自己“能力太有限了”。在权力主导的社会里,需要的不是坚持理想的“一根筋”,而是随遇而安的“万金油”。任增颖的可悲之处就在于,当大多数人选择当“万金油”时,任增颖却选择当起了“一根筋”。

任增颖在给老朋友的短信里写道:“要环保,不要悲情……我无意成为悲剧的主角。”事实上,任增颖的现实境遇说明她正是那个悲剧的主角。某种程度上说,她的命运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东西。所以缺少“一根筋”的其实不是任增颖,而是说一不二的权力。 高路文 陶小莫绘

是谁让“地沟油”产业化规模化

在媒体已经曝光的情况下,相关监管部门不应再有任何借口,必须尽快顺藤摸瓜,彻底查清、摧毁地沟油的地下产业链。对那些失职、渎职的监管人员,要坚决问责。

新华社记者历经一个月、数千里艰难追踪,初步揭开京津冀地沟油产业链冰山一角。天津、河北甚至北京都存在地沟油加工窝点,其规模之大出人意料。加工出的油通过“地下渠道”不断流向食品加工企业、粮油批发市场,甚至以小包装形式进入超市。

关于地沟油,这已经不是媒体第一次曝光。但有些监管部门似乎不太把地沟油“放在眼里”,比如去年,北京市工商局有关人士曾表示,地沟油的酸败非常厉害,臭味很大,而要想把酸败味消除,进行提纯,其成本是很高的,因此不太可能进入餐馆再使用。现在看来,监管部门低估了造假者的能力。

从报道来看,地沟油工厂成功的“秘诀”大体不外乎两点:一是这些违规者“组织严密”,形成了“势力”,有了“老大”,客观上给监管带来很大的难度;二是必然存在公职的庇护,正如某“地沟油”加工窝点负责人所说,“没有关系、没有背景是绝对不敢炼油的。”

但不管客观难度,还是主观不作为,监管部门都难辞其咎。任何一种食品的监管,大致分为原料、生产、销售三个环节,但在这三个环节上,“地沟油”的监管都存在很多漏洞。

据统计,北京市每天餐厨垃圾的产生量大概为1750吨,而正规途径的日处理能力只有五六百吨。每天1000多吨的餐厨垃圾去向不明,无疑是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但有有关部门一直未拿出解决之策,这就为地沟油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

在生产环节上,许多地沟油工厂不仅有日均几十吨的惊人产能,其中一些还证照齐全,包括政府信誉担保的食品QS认证,由此地沟油工厂能“合法经营”十几年。而在销售环节上,地沟油工厂老板“只要找人,什么证都能办下来”,核实证照等监管手段形同虚设。

在媒体已经曝光的情况下,监管部门不应再有任何借口,必须尽快顺藤摸瓜,彻底查清、摧毁地沟油的地下产业链。更重要的是,对那些失职、渎职的监管人员,要坚决查处问责。

地沟油的产业化之所以能够在京津冀一带做大,就是跨行政区域食品安全监管的薄弱。这样的情形在前段时间曝光的“黑心烤鸭”事件中,也曾经出现过。北京的执法人员到了河北农村,却什么都查不出来。

京津冀一体化呼吁了很多年,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现在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表明,京津冀一体化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也亟待浮出水面。而地沟油产业既然已经在京津冀的监管夹缝中“做大”、“做强”,那么,京津冀责无旁贷也当联手重拳出击,彻底根治这个餐桌上的顽疾。地沟油事件也说明,跨区域打击食品安全犯罪,当成为全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新课题和突破点。 海涵